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客家人的名字與命名
－以桃園縣新屋鄉為例

研究主持人：李廣均助理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研究者簡介

李廣均老師畢業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的社會學博士班（1997），曾任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助理教授（1997-1998），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專任助理教授（1998-2003）。2003 八月起，李老師開始任教於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次年夏天與該校客家學院社會文化研究所合聘。李老師的開授課程包括普通社會學、婚姻與家庭、族群關係、多元文化社會、醫療社會學等，研究興趣包括族群關係、多元文化、醫療與社會、文化社會學。目前李老師正著手研究的主題是從文化社會學的角度來探究「名字與命名」的當代意義。李老師最近的論文著作包括 “有關戰後台灣社會民族主義社會性格的幾點思考”，收錄於林佳龍、鄭永年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2001 年，台北：新自然主義出版公司）；”男人的名字和女人的名字-以「國家考試金榜題名錄」中華民國六十五年至七十四年考試及格人員為例”，《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新刊一號（原《婦女與兩性學刊》第十三期）：83-121（2002 年）；”「賺吃人那有時間來破病？」- 抗生素濫用與感冒患者求醫行為相關性初探”，《國立中央大學社會文化學報》17:66-85（2003 年）”。

目次

1.0 前言

2.0 相關文獻之回顧

3.0 研究問題與方法

4.0 訪問資料的討論

4.1 農業社會的使用習慣

4.2 家族中心與個人中心

4.3 印象經營

4.4 命理產業的出現與影響

4.5 名字中的性別差異

4.6 階級、社會流動與命名

5.0 討論與結論

客家人的名字與命名 - 以桃園縣新屋鄉為例

假如你要判斷一個人他是否為客家人，可以問他的母親叫什麼名字，或看他的身分證母親欄，其母親的名字為 XXX 妹，你問他是否為客家人，他會告訴你他是客家人沒有錯。當然，假如他的母親名字不是 XXX 妹，並不代表他不是客家人（楊國鑫 1988）。

1.0 前言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閱讀一份報紙時，似乎可以很輕易地判斷這是一個男人的名字或是女人的名字，名字中的性別差異非常明顯。同樣地我們可以試問，名字中是否有明顯的族群差異呢？上述一段引文告訴了我們某種客家人的名字特色，這不僅是客家族群的命名習慣，也是客家婦女的名字特徵。名字之中是否還有其他明顯的族群特徵？客家人的名字、閩南人、原住民或是外省人的名字又有何差異？這些差異是否有何文化與社會意義？本計劃的提出即是想從這樣的角度來研究客家族群的文化特徵，探討客家族群自我意識的發展變化，並比較整理客家族群與其他族群的文化差異。

從「名字和命名」的角度來了解「客家人」此一主題適合嗎？回答此一問題前，有一點必須釐清：那就是「名字與命名」的研究重點是命名者，不是被命名者，分析對象是名字本身，不是使用的個人。此一研究不是如一般命理業者要去預測，取了某一類名字者是否和個人財富地位取得或是婚姻幸福有何關係，我們要問的是，命名者是誰？命名的考量與期望為何？為何取這個名字？不是那個名字呢？是否有何文化與社會意涵？

人是唯一會為自己和其他同類取名字的動物，名字成為一種人類特有的文化行為，名字的決定和使用可說是一種文化共通性。不過由於歷史經驗、社會結構、價值信念的不同，許多地區的人們取的名字並不一樣，名字也因此成為一種文化差異。文化共通性與文化差異正是切入探討「名字與命名」此一文化現象的兩個思考起點。本計劃將有關文化共通性的探討稱為文化人類學的角度，文化差異的比較則歸為文化社會學的觀察。

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探究的問題包括，人類使用名字的起源與改

變、名字的組成結構（單、雙名之分）、重複程度（菜市場名的多寡）、意象類別（物質條件、命理考量）等，如何受到某些社會性因素或力量的影響。這些影響因素包括人口數量、社會組織、語言特性、都市生活、民族國家、大眾媒體、官僚體制等。例如，以採集或漁獵為生的部落社會其生產力有限，人口數量成長緩慢，命名方式也較為簡單，多以大自然事物為參考。隨著生產技術的提高，人口逐漸增加，社會組織日趨複雜。許多從狩獵採集轉變成園藝社會的原始部落，均會發展出所謂的親子連名制、親從子名制、子從親名制等命名方法，主要是反映愈來愈重要的家族關係和親屬團體。

農業社會出現之後，社會組織更趨複雜，家族成為分配財富和權力的主要場所。為了解決財產繼承與分配的問題，農業社會常會發展出複雜的啄喙排序機制（peck order），華人社會中以家譜為依據的輩份排名（分嫡庶男女）就是其中一種常見的命名方式。現代民族國家出現之前，許多人際區分並不是使用名字，而是以角色或關係互相稱呼（如老爺、娘、外甥、管家）。現代民族國家出現之後，為了推動戶政並落實人口統計，人一出生之後就要報戶口，也因此需要取個名字，而且不能隨意更改。現代都市生活的出現（社會互動更為頻繁）與大眾媒體的興起，也會影響我們決定名字的方式。公眾人物或流行趨勢會成為許多人命名的參考，名字的集中程度或重複性（菜市場名）會因此而改變。

從文化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則可以探究名字的階層意涵，討論名字如何成為不同社會階層（性別、族群、階級、世代）之間的「象徵」界線。以研究差異著名的法國社會學家 P. Bourdieu，曾經以象徵權力來解釋社會秩序的正當性基礎。

P. Bourdieu 的一個基本假設是，除了意識型態和物質條件的掌控之外，階級社會的維持與再製還需透過象徵權力的中介才有可能。象徵權力以一種再次確認的方式，正當化宰制階級的意識型態以及與此相依存的經濟分工關係。換言之，宰制階級不只控制了經濟權力，更透過象徵權力的運用，使他人接受符合其利益的世界觀。

Bourdieu 進一步指出，分類是階級鬥爭的一個基本面向，安置與灌輸一個區劃視野的權力乃最卓越的政治權力（Bourdieu 1989）。以 Bourdieu 的語言來看，命名即是一種分類的象徵權力，名字則是已結構化的分類系統。名字的產生就是社會分類的完成，也是個人社會位置的就位。一個名字適合誰，誰會使用某個名字，不僅是社會事實，也是社會秩序的一部份。當被命名者接受命名者決定的名字之後，他或她也接受了某一世界觀，支配也因此完成。而透過日常生活中不斷的使用和流通，名字也會繼續不斷地強化既定的社會秩序與世界觀。

我們可以進一步論及，名字的差異可以成為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一種文化差異。如果能夠對於名字進行分析比較，我們可以了解不同階層之間界線的形成或是改變，這是「名字與命名」的文化社會學意涵。例如，名字中是否有性別差異，與既有的性別角色與性別分工之間存在有何種關係？不同族群在使用名字上是否會有類似的情形？不同族群在接觸之初，名字的差異一定非常明顯。可是時間久了之後呢？第二代或第三代之後的命名模式呢？名字是否可以成為族群之間的同化指標？如果族群關係發生逆轉，名字的決定和使用又會發生何種變化？

社會結構的開放性與向上流動（upward mobility）的可能性也會讓中下階層者在取名字時有不一樣的考量。中下階層在決定名字時是否會有仿效的對象？如果要仿效，又會仿效誰的名字？公眾人物、影視明星、政治人物就是許多可能的仿效對象。相對地，當名字作為一種階級界線崩解之後，中上層階級又會如何命名來避免階級界線的模糊呢？換言之，不同社會階層之間是否在命名上進行某種無聲的文化競賽？

客家族群是台灣社會的主要族群人口之一。隨著台灣社會本身的現代化、全球化與國內族群關係的變化，客家人口自我意識會發生什麼變化？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夾雜著被其他多數族群同化的壓力下，客家人如何確保自己的族群意識與文化界線？本計劃認為，經過適當資料的整理分析，「名字和命名」可以成為了解族群文化發展和變遷的切入點。本計劃的提出即是想，透過對於客家人名字與命名經驗的整理分析，探討客家人自我認同與族群意識的發展與演變。

2.0 相關文獻之回顧

過去以來，有關「名字與命名」的研究並不多見，主要是來自於人類學者在進行田野調查所整理發現的各種不同部落社會的名字與命名方式。社會學文獻中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兩個主題：其一是將「名字的選擇」視為移民「同化」於移入社會（host society）過程中的一種文化適應，其二是從社會階層的角度（如性別、族群）來探究名字的文化社會學意涵，目前以後者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可觀。

Miller（1927）曾經以社會人類學的觀點對於「名字和命名」的現象提出觀察，發現在許多不同的、分散各地的原始部落社會中，存在有一些共同的命名習慣。起初，嬰兒的命名不外是根據生理特徵，或是為了紀念或記錄出生時的一些重要事件或景物特徵，也有可能是從超自然的角角度來命名，以達到消災解厄、趨吉避凶的考量。不過隨著

社會組織的演化，名字開始承載一些明顯的社會功能，例如親從子名制（teknonymy）就可視為是，人類從母系社會轉變至父系社會過程中所發展出來的一種文化適應。

美國哈佛大學社會系教授 Stanley Lieberman 可以說是目前對於「名字與命名」此一主題最具研究成果的一位學者。Lieberman（1984）首次為文討論語言現象與社會現象互相交錯所具有的社會語言學意涵，文中討論了名字意象產生的社會性條件、名字的種族與族群意涵、奴隸制度下的名字，也從歷史背景探討為何某些名字（如 Beverly）會特別受到歡迎而流行起來。

Lieberman and Bell（1992）則是分析美國紐約州的出生紀錄後發現，名字的語音結構（如字首與字尾）、字源、重複性、典故等都受到父母親本身教育程度與種族背景的影響。雖然 Lieberman 沒有在該文中明顯指出，但細心的讀者可在文中感受到，此篇論文似乎有和以研究「差異」而著名的文化社會學者 P. Bourdieu 互別苗頭的用意。Lieberman 多次在文中強調，雖然名字是一種社會界線，但不同社會群體所取的名字之內容和形式又是如何決定的呢？如果只是為了區隔，社會群體的名字差異可以有許多可能，但為何這些人（群體）會選擇這些名字？那些人（群體）會選擇那些名字呢？相較於 Bourdieu 對於「差異」之政治、社會功能的解釋，Lieberman 則是著重在內在（intrinsic）因素如教育程度和族群背景對於命名的影響。

名字的性別差異或是性別階層意涵在相關文獻中已有一些不錯的發現和討論。Rossi（1965）曾經從夫妻與親屬團體的互動角度探討了美國中產階級的命名習慣，結果發現多數美國家庭的男孩會比女孩更容易以直系血親（如爺爺或外公）的名字來命名，男孩因此也被認為是家族延續的象徵性承載者（symbolic carrier of the temporal continuity of the family）。

Lieberman, et al.（2000）則是嘗試回答為何在女性主義思潮與社會運動多年來的影响下，兩性通用名字（androgynous name）並沒有出現明顯而持續的增加？該文發現，每當有新的兩性通用名字出現，過了幾年之後此一兩性通用字就會逐漸成為以女孩為主要使用者的女名，兩性通用名字的數量也因此無法持續增加。作者的解釋是，社會階層較低的女性會嘗試模仿男性（社會階層較高）的生活品味，包括衣服、髮型與命名等。為了維持男性既有的階層優勢，父母在為男孩命名時會避免使用兩性通用名字，以免被誤認為女孩。因此雖然社會中不時會出現一些新的兩性通用名字，但兩性通用名字卻會在命名者「男女有別」的考量下，最後仍然成為以女孩為主要使用者的女名。換言之，雖然低階群體（如女性）會嘗試跨越界線，企圖模仿高階群體（如男性）的生活

品味，但宰制團體並不願意看到「界線」 - 不論是象徵的還是實質的 - 的鬆動或混淆，因此會在命名時避免使用某些容易被誤認性別的名字，藉以維持性別界線的區隔。

國內學者劉增貴(1996)蒐集了秦漢迄三國可考的五百七十多個婦女名字，從家族、性別、社會等三個層面來討論當時社會的兩性角色與婦女地位。劉文發現，男女通用名佔研究案例中的三分之二，可見當時社會對兩性道德、行為的要求，相去尚不甚遠。婦女名字中雖有卑婉的一面，但也有堅捷剽猛之名。但強調婦女容貌、體態、性情的女性化名字已在發展之中，強調「定國」、「安世」等抱負的名字也只出現在男名。

李廣均(2002a)曾經以民國六十五年至七十四年的國家考試及格人員(出生年約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八之間)的次名做為分析對象，結果發現男女名字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字庫、集中程度、意象等三方面。第一，男女使用著幾乎完全不一樣的字庫。在前四十個最常出現的次名單字裡，男女通用字只有一個。其次，男女次名單字的集中程度並不一樣。男人名字重複性低、內在變異性大(前二十個常用次名解釋了百分之二十四的樣本人數)，女人名字重複性高、內在變異性小(前二十個常用次名解釋了百分之四十八的樣本人數)。第三，男女名字各有不同的意象。男人的名字表現了對於物質成就、品德學識和家國公共事務的重視，女人的名字則以感官化和飾物化為主。不過此一研究的分析樣本只包含十年內國家考試及格人員的次名用字，嚴格來說這只是一種橫斷面的觀察。對於文化現象的研究觀察而言，十年之內的資料並無法窺探出長期以來命名趨勢的改變。若要了解命名趨勢的變化，我們還必須以更長的時間如五十年或一百年為觀察單位。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李廣均(2002b)嘗試探究台灣社會中兩性名字差異的長期變化趨勢。該文使用醫學中心掛號資料整理台灣社會百年來兩性名字的差異與長期變化趨勢。結果發現，男人名字和女人名字之間的差異有時代變異性，主要表現在組成結構和用字選擇的不同。就組成結構而言，二十世紀初期的男名多雙、女名多單，主要是因為宗族社會的女性沒有資格在名字中使用字輩。在用字選擇上，兩性名字不僅集中程度不同，字庫選擇也涇渭分明，分別表現出明顯不同的意象指涉。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宗族社會日漸式微，傳統命名規範鬆動，兩性名字的組成結構愈來愈接近，但是用字選擇的性別差異並沒有消失。相對於男名對於權力、財富、地位的重視，女名的意象指涉卻始終被排除在外。自一九五零年代以來，女名中還出現了許多同音字，四聲注音中以一、二聲為主的比例也比男性高出許多。該文認為，女名聲韻組成的同音化和同聲化突顯了女性專業角色地位的不足和性別刻板印象的複製。

名字中的族群差異可說是目前非常值得努力研究的一個領域。在多族裔社會中，不同族群的名字原本應可表現出各自的文化特色，但事實卻不一定如此。歷史上，弱勢族群和優勢族群接觸之後，弱勢族群常被迫「同化」，在姓名的使用上改變原有的作法，這種情形可以台灣的原住民為一代表。根據王雅萍的研究指出，台灣原住民共經歷過（一）清朝的賜姓政策、（二）日本領台時期的皇民化姓名政策、（三）國民政府時期的回復姓名等三個歷史階段（王雅萍 1994）。

Lieberson (1984) 曾經討論到美國移民初期，白人物主如何為黑奴命名。研究發現，白人物主對待奴隸的態度和其對待所飼養的牲畜沒有太大的差異。許多奴隸的常用名字（如 Jack、John、Dolly、Kitt 等）和牛馬驢等牲畜的名字有很高的重複性與相關性。因此，當時許多黑奴重獲自由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換一個新的名字。Zelinsky (1970) 則是分析 1790 至 1968 年美國東部十六個郡縣的男性出生資料發現，常用名字的次數分配可以做為一個測量美國不同時代、地域之間文化發展與變遷的有效指標。該文認為，如果依據使用名字的方式，近兩世紀以來，美國東區各州共可區分為新英格蘭（New England）、內地（the Midland）、南方（the South）等三種不同的文化次系統。

Watkins and London (1994) 則是以 1910 的美國人口普查資料為分析對象，比較第一代和第二代義大利移民與猶太移民的名字差異。此外，作者也以深入訪談的方式，來收集第一代移民來到美國時的命名考量。結果發現，雖然名字的改變可以被視為是移民同化於美國社會（Americanization）的一種文化適應，但也是移民本身族群化（ethnicization）的重要過程。移民之間的非正式社會互動（informal social interaction）常是許多父母命名選擇的參考來源。

李廣均（2000a）發現，「興中」、「復華」、「偉民」、「建國」這樣的字是許多第一代或第二代外省人命名時的常用字。以「華」字為例，外省籍名字中出現的首名多是動詞，如「復華」、「振華」，本省籍名字中的首名多是名詞或是形容詞，如「文華」、「榮華」等。對於上述差異的一個合理解釋是，對於外省籍命名者而言，「華」所代表的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其命名期望無非是希望被命名者可以復興中華、振國治家。相對地，本省籍命名者比較沒有那麼強烈的民族國家意識，「華」字所代表的意義比較偏向以能力、時間、財富這樣的解釋較為適當。

3.0 研究問題與方法

本計劃的主旨是研究客家人的「名字與命名」，希望透過對於客家人名字的整理分析，探討客家社會文化的發展與族群意識的變化，藉此也可呈現「名字與命名」所具有的文化與社會意涵。主要的研究問題包括，客家人如何為下一代命名？是否按照家譜或族譜的字輩規範？取那些名字？命名的考量與期望是什麼？是否有何共同的客家族群特色？名字中的性別差異又是什麼？

本研究計劃有幾個主要概念需要釐清，這些概念也將是整理檔案資料與進行田野訪談時的觀察重點。在自變項的部分，主要研究概念包括世代、職業、通婚、教育程度等。依變項的部分則是包括被命名者的性別、首名用字、次名用字、次數分配、集中程度、意象種類等。中介概念的部分則是要考慮台灣社會各個階段的歷史條件與社會結構，如台灣社會本身的現代化程度、都市化情形、媒體普及程度等。

性別 男女有別，名字中的性別差異最為明顯。本研究計劃也想檢證客家男人的名字與客家女人的名字之差異。這些性別差異和其他族群又會有何不同？整理檔案資料與進行田野訪談時，將會依被命名者的性別來進行觀察。

世代 不同世代的人群常擁有不同的歷史經驗與生活條件。第一代移民來台的客家人面對的移民情境最為險惡，客家意識的凝聚與傳承也最為強烈。而隨著後續世代的繁衍，客家意識會如何發生變化？個人與客家宗親組織的依賴關係會如何改變？本計劃會特別注意不同世代之命名者的命名考量，以及對於族譜命名規定的參考使用情形。

通婚 婚姻關係的族群組成也是影響社會互動程度的重要指標。從族群互動的角度來看，客家人的婚姻關係可分為內婚（與客家人通婚）與外婚（與非客家人通婚）兩類。外婚者會比內婚者更容易有機會接觸到非客家人，也因此較有可能會有不一樣的命名考量。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是影響命名的重要因素之一。教育程度的高低關係個人文字能力、媒體使用習慣、人際互動範圍等。個人教育程度提高後的影響之一，就是對客家宗親組織依賴的降低，表現在命名上，就可能會有脫離傳統族譜命名規定的可能。

本計劃原訂將以下列兩種方式收集研究資料。第一類是檔案資料的整理；第二類是田野訪談。本次計劃的主要研究區域是桃園縣新屋鄉。新屋鄉位於桃園縣西部，臨台灣海峽，面積共 84.9 平方公里。新屋鄉全鄉計 23 村，總人數共四萬九千餘人。選擇新屋鄉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新屋鄉有許多明顯的客家人口（徐姓、楊姓、鍾姓、范姜姓等）

居住，其二是新屋鄉距離中央大學僅十餘分鐘車程，便於進行田野訪問。

本計劃預計先聯絡鄉長、各村村長請求合作，探尋民眾宗祠是否有家譜或族譜的人名資料可供登記，以進行第一階段的資料整理與統計分析，分析焦點將放在描述統計的整理。例如，命名單字的次數分配、集中情形和意象分類。統計處理主要包括首、次名單字次數分配的統計、每一單字所佔的百分比、相關單字的累計百分比。並將整理出不同性別的常用單字（以前一百個為準）。

其次，本計劃也將進行客家村庄住民的深入訪談。訪談對象將透過村長的徵詢與推薦，以具有家譜、宗族地位者優先考慮。訪談對象將依不同世代進行，訪談主要目的是收集受訪者當初的命名經驗，比較不同世代、不同職業、不同婚姻組合者為下一代命名時的考量與期望。

本計畫執行完畢之後，預期完成的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包括：1) 提供一個從「名字與命名」的角度來認識客家族群的社會文化面貌，了解客家人自我認同與族群意識的演變；2) 比較客家男人的名字與客家女人的名字，檢驗客家人的性別意識；3) 從客家人的命名經驗來觀察個人與客家宗親組織的依附關係；4) 就理論發展而言，有助於了解「名字與命名」此一文化現象和族群關係、性別意識、世代差異之間的各種關係。

本研究計劃的某些限制必須先行釐清。第一，「名字與命名」的分析只是了解客家人人口自我認同與族群意識的一個切入角度，不是唯一的角度。對於族群文化現象的觀察，還必須參酌其他相關研究內容，才可以獲致一較完整的面貌。第二、此次研究計劃的提出，只針對桃園新屋地區的客家住民進行訪談，樣本非常有限。相關發現只適合針對此一地區來討論，不應擴及於其他地區的客家人。有關台灣社會其他地區的客家人口之認同經驗或變遷應有所保留或可另外進行研究。

經過計畫審核之後，本計畫的執行情形出現了一些重大的改變，最主要的原因是經費的縮減。原訂申請的計畫經費是三十八萬元，可是實際通過的執行經費只有五萬元，許多原訂安排進行的資料收集與田野訪談都只好取消，只能以先導計畫（pilot study）的形態進行一些試探性的訪問。訪問結果與討論分述如下。

4.0 訪問資料的討論

以下本文將以部分志願受訪者的回答來討論台灣社會中客家人的名字使用情形、意涵與改變。主要討論的面向有農業社會的使用習慣、宗族社會式微的影響、印象經營、

大眾媒體的普及、命理產業的出現與影響、性別差異、社會流動與命名等。

4.1 農業社會的使用習慣

農業社會取名字時，除了希望討個好彩頭之外，也常常從生活中取材，隨手拾來都是可以命名的對象。可以說是看到什麼，想到什麼，就取什麼名字。農業社會早期，許多名字的決定是先有音，才有字。父母先決定怎麼叫，到了戶政事務所報戶口時，再由戶政人員選一個發音接近的字報了上去，至於字義是否文雅適當就不在考慮之內了。這一方面是因為父母教育程度不高，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父母比較擔心的問題是孩子可不可以養得活，名字好不好聽並不是那麼重要。

爺爺那一代飽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波及，根本沒錢請算命師，也沒錢去學這方面的學問來幫家中小孩命名，取名也都隨意長輩們取。到了爸爸這代也一樣，因為家中是務農為主生活也很辛苦，聽父母說每天都早上四五點起床去餵牛和家畜，還要幫忙賣菜種田等，根本沒有假日，晚上八九點就睡跟現在我們的生活完全不同，相當辛苦，連買個書包都要阿媽連夜去賣菜跟家禽才有錢買。所以取名字也一樣，只要好聽好唸好寫就好，或許這跟阿祖們的教育程度有關，我的阿祖幾乎都沒讀過書。到了我們這代家境轉好些才有錢特地請風水師幫忙算命取名。(H1)

家中祖譜中有許多名字都讓人深感難以想像，這本從乾隆時代到今天的祖譜，名字的演變可看出時代的變遷，人們重視事物的不同。從乾隆到光復時代的祖宗們，其姓名從兩個字漸漸變成三個字，而其名的意義又通常是周遭可看的見，可觸可及的物品，例如：從□銀，□粉，□市，□糖，□蘭，□杯…一直到□清泉，□雲梅，□火元，□彩，都是以日常身邊之物來命名。(Y1)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國民政府來到台灣，進一步地推動了台灣的社會經濟發展，從早期一九五零年代的進口替代工業化，一九六零年代之後逐漸轉型成以外銷導向為主的工業化，台灣從一個農業社會發展到工商業社會。早期台灣的經濟活動

以農業生產為主，人民生活以勤儉爲要，從名字就可以看出時代的脈動與社會變遷的軌跡。

大概來說爺爺那一輩的命名方式，都是用簡單的國字來表達對於生活周遭向要所求的事物，而且都侷限於和身體健康或者能夠平安如此而已，並沒有很高遠的志願，只是求個溫飽而已，這是我爺爺那一輩的生活狀況。從名字上可以大概知道，他們那一輩子日子過的並不好。(D1)

我們這一代經濟普遍比較富足，所以命名的時候比較有閒錢請算命師命名，哥哥他的命名方式是由爺爺請算命師選幾個合八字的字，再由我爸爸媽媽尤其中挑選出來合適的。由於父母親都是於郵局任職局長，知識教育較豐富，比起以前農村社會命名的名字更具有對孩子的期許也有更多含意。(L1)

4.2 家族中心與個人中心

二十世紀中，台灣社會結構的一大轉變就是宗族制度的式微。造成宗族式微的原因是什麼呢？一方面日本殖民台灣五十年所帶來的現代化經驗，不僅奠定了現代化的基礎建設，也帶來現代化的教育和觀念，改變了人的想法。一九四九年後，國民政府以發展成長爲優先考量的經濟建設更將台灣的現代化更進一步地往前推動。生產結構的改變、都市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外來文化的影響，都改變了台灣社會的價值觀，這也是我們了解客家人名字的世代差異時，不可或缺的一個背景。

在傳統農村社會中，老一輩的人大多有依族譜命名之習慣。盛昌的盛、明香的香，都是來自族譜，族人中同輩多有名字只差一個字的現象，一來可以分辨同族人之輩分，二來也可以作爲凝聚家族向心力的一種表達。特別一提的是，依族譜命名是男子才有的現象，可能受到早年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認爲男子才能繼承家業，傳遞家族的香火，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人口由鄉村移往都市，大家族的沒落與小家庭的興起，社會開始重視個人，命名的方式較不受限於族譜，多半是由父母親自行取名，也因此

出現較多的變化。(Y2)

在父親輩和我這一輩的名字中可看出第二個字為同一個字，主要的原因是祖父成年離家後，只有伯父和祖父兩人南下，其餘的兄弟姊妹都留在新竹，爲了以後便於相認父親輩或我這一輩，且祖父自己的名字也是按照祖譜排序，所以在祖父在世時，就強制父親輩的人必須遵守。、、、我們家中父親輩和我們這一輩照祖譜排序方式可說是祖父意念的貫徹，這跟祖父是所謂「移民族群」有關，因爲少年離家之後，雖然自知再見家人的機會很少，所以便在取名時做如此之安排，應該是一種精神的寄託，到我們這一代已無這種觀念，取名時以不再依照祖譜排序，移民性格已消失。(C1)

我的伯伯林義本由我曾祖父命名時是叫做林坤旺，有讓這片土地興旺的意義，而在祖父去報戶口的時候，戶政人員發現我的曾叔公叫朝旺，並認爲晚輩的命名應該要避諱，所以臨時由戶政人員再起了一個名字叫義本，以義爲本，想必這戶政人員是唸過一些忠義小說的，而爲什麼會爲了避諱而將原本的坤旺完全改掉就不得而知了。(L1)

當個人逐漸從家族中脫離出來，家族對於個人的約束力已不如從前，許多事情的決定上已可以由個人來決定，如工作選擇、婚姻對象，當然還包括如何決定下一代的名字。隨著商業社會的日漸發達，大家庭的社會結構也逐漸被小家庭所取代，輩份觀念也不再像以前那麼重要。許多家庭都會爲了小孩的身體健康、學業問題而幫小孩改名，即使是必須更換掉原本的字輩。其中做這些決定的有祖父、媽媽都有。似乎族譜家規（祖宗的規矩）也要不敵現世命理的考量。

家裡從第十五代開始，都以族譜命名。自第十五代至第二十七代，分別爲文、武、勝、賢。至祖父的第二十八代，都還是因循這個慣例，然而到了第二十九代，堂伯們仍依族譜命名的同時，父親的名字似乎破壞了這個慣例。當堂伯們分別被取名爲勝添、勝福、勝金、勝俊，祖父卻將父親命名爲「坤和」。祖父說，這是根據姓名學的命名。可見，從民國三、四十年開始，族譜，似乎不再是命名的唯一聖經。接下來到我這輩

的第三十代，十位男性之中（女性不需依族譜命名），只有四位依族譜命名。如今的命名趨勢，似乎父母的自由意志，重要性已大過於所謂的「家族傳統」。(B1)

雖然宗族制度已經式微，字輩的使用壓力也不如以往嚴格。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字輩使用的新意義。在訪問中發現，許多家庭中兄弟姐妹的名字都會有一個共同使用的字眼，這並不是爲了要配合族譜的排名，而是爲了要讓同一家人有認同感。而且這樣的取名方式是跨越性別界線的，也就是不分男女都會有一個共用字。這是和傳統命名最大的差異。以前只有男生可以排字輩，女生則不行。但在目前，爲了強調一家人的感覺，共用字的使用已經脫離字輩的限制。

但是到了我們這一代，此種聯繫與對家族觀念的重視，隨著工商業社會的變遷，逐漸轉爲以小單位的家庭爲中心。堂兄弟姊妹之間，不再有共通的字，而是轉變爲同一父母（家庭）間的兄弟姊妹才有相同的字。如我堂哥們的「志」，堂姊們的「蘋」，和我和我弟弟的「誠」。這似乎暗示著，同一代中不必再有明顯相同的聯繫與標誌，家族成員間的緊密度也不如以往，小家庭成了新一個單位的互助體。親戚之間的往來互動，也已不如從前的頻繁與直接。以往那種整個家族齊聚一地的榮景也已不復見，從光復初期的齊聚花蓮，到如今分散於花蓮、台北、桃園、台中等地，名字的改变，也記錄了我們從一個大家族慢慢演變到今日分散而居的情形。(S1)

孩子名字大都是由爺爺來決定，爺爺講的就是好，我爸爸他們大都是不會有反對意見的，而我們這輩的孩子都是照著祖譜來排的，向是我這代的男孩子，中間的名字就是要取做”忠”，而女孩子的話就是要取做”依”，基本上都是照這樣取的，但是由於我叔叔和我爸爸年紀有一段差距，他很晚才出生，而叔叔又晚婚，所以當他生了第一個孩子時，爺爺已經去世了，但是奶奶還是希望他可以照著我們家的慣例取，所以仍然是忠字輩的，叫做忠□，但是他今年，就在前一個月不久又生了一個小男孩時，大家心裡多少都覺得叔叔可能不會照慣例命名了，果然，他帶去給人家算命，然後自己先取了一個名字後再跟我們大家說，雖然有點訝異，但是並不會覺得

奇怪，因為現在的人對於名字的選擇好像不再是那麼嚴格，不再會想要照著祖譜或是特定的字來取。現在的年輕父母比較有自己的意見，而且大都以自己的意見為主去替自己的孩子命名，所以名字要好唸、好聽、好寫、或是要怎樣都是由年輕的父母自己去決定，家裡其他的親戚頂多幫忙提個意見，決定的還是他們的父母。(L3)

4.3 印象經營

隨著現代都會生活的出現，名字已經成為一個需要在許多公共場合中使用的身分指涉符號。不管是上學、就診、工作、申請證件，每個人都必須時時使用自己的名字，於是名字好不好聽、好不好記也成為一個愈來愈需要謹慎考慮的事情。

人口集中與都市化生活是現代社會的一大特色，此種社會結構的轉變使得現代人比起以前有更多機會必須公開使用自己的名字。在每天都需要與許多陌生人接觸的都市文明裡，一個可以傳遞良好印象的名字變得非常重要。如此一來，不僅新生兒的命名變得很重要，即使是改名也要請專家協助。取個好名字就是希望讓別人留下好印象，讓別人容易記得自己。

媽媽與姨媽的本名為阿白與阿甘，皆為隨口號名，但是改名的原因是因為後來姨媽與媽媽在求職的需要上被迫改一個比較不俗氣的名字，但是現在的名字雖然為姨媽所取，來源卻不明，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其命名的趨勢，是以瑩、芳、靜等等一般女性的特色作為其命名的依據。(W1)

媽媽的原名是□麵，因為在外公外婆的家庭中，他們對於女生的命名也不注重，據我媽媽所言，她說她的名字在要報戶口的時候都還不知道是什麼，是戶政事務所的阿姨幫媽媽取的名字，而後等媽媽到了出社會的時候，覺得□麵這個名字不勝雅觀，所以又自己取了□智如這個名字，一直到現在，外婆還是一直叫媽媽為阿麵。(Y3)

4.4 命理產業的出現與影響

隨著台灣社會現代性的提高，個人對於宗族組織的依賴性正逐漸降低，宗族或家族對於個人的控制已大不如前，影響之一就是命名權的釋放。命名者不再一定是祖父母，而可能是由父母、其他親友或外包給命理業者來決定，其中又以外包命理化對命名的影響最大。在這種變化下，取名字的考量在於好不好聽、筆劃數好不好、命理格局、陰陽五行配合度等等，不再是有沒有排輩分、好不好養等問題。

根據內政部有關人民團體的統計，和命名有關的命理業者在過去這二十年內有明顯的增加。民國八十年以前，在內政部登記有案的相關命理團體只有四個，民國九十一年時則已增加為三十個，而且還在陸續增加之中。¹這還只是全國登記有案的統計數目，如果加上那些未登記的、以地方服務為主的命理團體或個人業者的話，其數量還會更多。

隨著資訊廣泛的流通，坊間有關命名與姓名學的書籍也相當普遍，甚至是網路上也都有幫小孩命名的網站，和以前只能請教算命先生的時代相比，這已是大大的不同。我們也許可以稱此為命名的平民化現象。今天許多父母是先由生辰八字來決定吉祥的筆劃數，再根據筆劃數翻字典來找字。如此一來，在外包化與命理化的影響之下，名字容易出現「撞名」或同質性的現象。因為命理業者取名字時所考量的因素不外是生辰、八字、生肖、筆劃、部首等因素，其所能提供的選擇字庫相對有限。如此一來，個人或家庭的紀念性、故事、時代社會的特殊性都被淹沒在命理考量之下，名字也因此出現一種去歷史和去故事的命名特徵，呈現了一種扁平化的同質現象。作者的一次訪談經驗可為佐證：

再來最容易跟名字扯在一起的就是算命了，遠的不提，光是我自己的名字就是算命下的產物，我現在的名字，是後來要升高中時才改的，所以現在這個名字陪我的日子還沒之前那個久，本來也是不信算命那一套的，但凹不過母親的意見，所以就只好改了，我記得那時有給我兩三個選擇，而我選擇那個只有改一個字的名字，從"湧"銘，而為何不用"勇"就好了呢，要用"湧"呢？算命先生是說一來是筆畫數目的關係，二來是我生肖屬豬的關係。而豬親水，因此有一個水字旁的名字，對我來說會比較好，而我始終是半信半疑。（W2）

我自己本身就有改過名字，國二的時候，我是和我哥哥一起改的，原本我們兩個人的名字都是爺爺取的，我叫□超，哥哥叫□強，但是就在我哥哥重考高中沒考上第一志願時，媽媽聽人說的，就帶我哥哥的名字給人家看，好像有人說命的不太好，於是，就拿去給命理師改，命理師說，是我的名字壓到我哥哥，是我的超壓到他的強，因為一直以來只有聽到超強而沒有聽過強超，超一直是排在前面，所以我壓到我哥，因此，我們兩個都改名，他說屬老鼠生在陰暗，需要有東西來照明，所以他建議我取一些有火、日…在名字的字中，例如燿、營、曜…等，我印象很深刻，他有好幾個名字給我選，除了□燿、還有營傑、營典…等，我一看到，我就馬上刪掉營傑，因為營傑聽起來就像淫賊。(S1)

其實原本我的名字叫做□倫。但是我的祖母，認為這樣我的好運都會「輪」來「輪」去，到最後都沒有我的份，所以算命又算了另一個名字，祖母認為好唸又好記，於是我的名字就決定為□達。然而我爸媽都說如果我想我可以改名，原因他們說是認為俗氣，我確認為還好。(H2)

不過當許多父母興高采烈地花錢請算命師取了一個宣稱具有命理優勢的名字之後，很快的就會在門診掛號時、上幼稚園時、學校註冊時發現許多同名甚至同姓者²。這裡有一點必須澄清的是，我們不該誤以為現在才有所謂的菜市場名，其實以前就有。早期菜市場名的重複情形更為嚴重。只是過去並沒有統計軟體的普及與使用，無法方便的統計出來。如今有了統計軟體與資料的近用（如大專聯考的學生名單），我們才會在最近幾年覺得菜市場名普遍了起來。

雖然父母親已經成為新的命名者，但還要考慮命理業者的推波助瀾，而且從事命理業者的性別組成主要是以男性為主。在命理化的考量下，名字的選擇只侷限在某些特定的命理因素中來考量（如八字、生辰、筆劃等），如此一來，個人或家庭的紀念性、時代社會的特殊性都被忽略，名字也因此出現扁平化的同質現象。

¹ 參見內政部社會司網站 <http://volnet.moi.gov.tw/sowf/index.htm>

² 根據筆者私下正在進行的訪談資料發現，佳良、宗翰、欣怡、詩婷就是幾個近來最流行的名字，多是出自算命師之手。雖然這並不是本章的主要研究問題，但命名外包化和命理化卻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社會議題：為何台灣社會的命理團體會增加？是命理行業技術的突飛猛進呢？還是民眾的困惑或是

弟弟出生時，是家族中的長孫，被老一輩的大人視為「金孫」，所以長輩們就拿著生辰八字去請教算命先生的意見，取做「偉任」，希望能負起偉大的責任，但是算出來的名字很容易重複，在同村裡，就有好幾個小孩都跟弟弟同名。(H3)

4.5 名字中的性別差異

自商周以來，名字中的性別差異就已存在，性別附加字已經出現在個人的名字之中。以民間故事七世夫妻之一的孟姜女為例，有一種說法是孟姜女並不是姓孟，孟只是她在家中的排行（老大），而且不是正房所生，所以排行用字是孟，不是伯。³凡嫡出（正妻所生）者稱伯，庶出（妾所生）者稱孟，而姜為其本名，女則是性別附屬字。至於男子常用名稱是「行輩＋本名＋父（或甫）」，其中的父、甫也是性別附加字，如伯姬父即為某人所生的第一個兒子；孔子的父親叫叔梁紇，以孔為氏，叔是排行用字，梁紇為本名，其全稱則是「孔叔梁紇父」（金良年 1989:11-12）。客家人使用「妹」字為女性命名也是類似的效果。

根據我的發現，在奶奶那一輩中，很多女生的命名，其中的次名都是用『妹』居多，這應該是那個時代特有的命名方式；還有因為我觀察到的都是以客家人為主，所以在那個時代，將女生的次名，命名為『妹』的，或許可以分辨他是不是客家人。(T1)

值得一提的是祖母的名字：參妹，因為在祖母之前都是女生，到祖母時，就不特意取名了，遂用排行順序簡單的帶過，妹字則是客家人常稱女性的用法，可以看出當時社會重男輕女的態度，也可以說是期待男丁卻落空的無奈。在屬於祖父名字的時代，命名與族群的關係似乎有某種關聯：有些特定族群的名字會常常出現一些字。常見的客家名中含有：「榮」、「妹」二字，「榮」表達了對家族興盛的發展，「妹」則是客家人常稱呼女子時所用字，參妹則是因為在之前都是女生到這個小孩時，就不特意取名了，遂

釋惑需求增加了？

³ 古制以伯、仲、叔、季來依次表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的排行順序。

用排行簡單的帶過，可以看出舊時代重男輕女的觀念與態度。(F1)

我的爺爺是個養子，所以姓劉可能不是我們最先的祖先，我們雖然最後祭拜都是姓劉的姓，但很明顯的我看到命名碑文，是從我爺爺開始。在那個農業時代生越多男丁越好，新木是希望農作物長的茁壯如新芽初長。客家的女子習慣在自己後面加個妹，我從前看我奶奶的身份證叫□□慰妹。當然前面是冠夫姓，但實際他原始名字叫□慰。(L4)

從這些資料中看來最能一眼就引起我的注意的莫過於我外婆的名字，因為其中的一個『妹』字，非常耐人尋味，也從此得知一個非常清楚的訊息，我的外婆她是一個女性。我個人認為外婆的名字會如此命名大概有幾個原因，像是男女性別、社會階層等等，就以男女性別來說，一般在家族中，小男孩在小孩子中稱輩份時都是以哥哥、弟弟、兄長來稱呼；而小女孩在小孩子中稱輩份時也就是以姊姊、妹妹等來稱呼，所以我想曾祖父們當初命名時，大概就是基於如此，而在名字中加上這樣容易區別男女的字眼，一方面省了不少去想和找好名字的麻煩。(H4)

如前文所述，影響華人名字使用習慣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宗法制度。宗族社會以宗祠家族為中心，強調一定程度的等級結構，根據血緣遠近來決定嫡庶親疏、世系次第、身份高低，也因此決定了資源、權力與聲望的分配。其中字輩就是一種為了突顯地位階序性的文化設計。什麼是字輩呢？字輩指的就是輩份的代表用字，如前文提到的伯、仲、叔、季。不過在宗法制度的成熟過程中，為了排行序輩，字輩的決定和使用出現了一些新的識別方式如數字、五行、偏旁等變化，最後則逐漸發展出字輩詩的作法，主要是決定於宗族大會修訂家譜時所決定的譜詩。

在宗法制度強調身份等級區份之下，女性常是字輩制度下的主要犧牲者。宗族指的是同姓共宗的男性親屬成員，家譜的記載也是以男性血緣脈絡的延續為主，因此只有男性可以使用字輩譜，女性並沒有資格使用字輩。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宗族社會裡，女性的生活空間非常有限，女名的使用也被限制在閨閣之中，所以才會有以「待字閨中」形容未出嫁女子的說法。宗族組織的特點決定了女名中是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有字輩的。因為，按字輩取的名字只有在宗族範圍內廣泛而複雜的人際交往中才有意義，而女名因使

用空間太窄，自然就沒有必要有字輩。除了出嫁前使用名字的機會不多之外，女性嫁人之後更只能以「夫家姓氏+己姓氏」稱氏而已（如張王氏），不再有使用自己名字的機會。以波迪爾（P.Bourdieu）的語言來看，冠夫姓的作法就是一種象徵暴力，也是父權制度中將女性附屬於男性的一種文化言行和象徵表現方式。

我的姊妹們，照年齡分別為淑芬、淑真、淑卿，名字都帶有淑字，其實這個現象不是一般家族所謂的字輩，只是我父親自己取的，而名字本身也沒有多大意義，都只是我父親念起來很順口就取了，當然也有參考過算命師的意見，但是他嫌算命取的都很難聽，所以自己取。（L3）

為什麼女性用字跟男性用字仍有這樣差異？第一，就是在意義網路中，大家都認定某些字只能用於某個性別的命名，這是長久時間下來所造成的，父母為了避免孩子因為某些性別未明的用字而讓人造成誤會，所以便不會選擇讓人陷入錯誤想法的字；第二，命理文化下的選擇性用字，許多人為小孩命名會參照命理師的意見，而命理師所給予的名字通常會使用的字是有限的，大部分的命理師，給男女的名字不會脫離傳統的意義網路，於是某程度上更固定了男女姓名的差異。（K1）

到了我父親這一代已經不再根據祖譜來取名字了！祖父母認為一個人的名字和他一生的氣運有關，故請算命先生來幫父親取名字。祖父母後來覺得一個大男人名字中有“文”覺得太柔弱了，所以祖父母在口頭上都是叫我父親“光堯”，但並沒有真的改名字！（C2）

不過其實從名字的性別差異上可以衍生出的問題是，現在雖然講求男女平等，可是就我的觀點來看，這只是“女性男性化”而已。一個現在的女生可以穿著非常男性化，頭髮是男生頭，甚至講話都是滿口髒話掛嘴邊別人都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對，反正平等嘛，女生也可以作那些男生做的事呀，就連不好的也一起照單全收，而反觀男性呢？現在在台灣有人可以接受一個男人穿著洋裙，學茶道，插花嗎？肯定一萬個人裡有 9999 個人說你是白癡。為什麼會男女差異？這是從開始有生命的那一剎那就定下來了，生

命就是這樣，根深蒂固，可是現代人卻有些好像壓抑太久一樣，女性變得像”打倒孔家店要全盤西話一樣，什麼都亂學”，就好像你也許會把你的女兒叫做陳進興，但又絕對不會讓你的兒子叫許麗麗是一樣的。(H5)

外婆的名字是「□□呆看」，其中□和□都是姓，這是因為外婆曾經當過別人家的養女，因此多灌了一個姓，而他的名字「呆看」，就像是很多老一輩人的名字一樣，再加上那時戶政人員不像現在這樣的熱心，因此就會出現這樣難看又難聽的名字。(H6)

4.6 階級、社會流動與命名

教育程度是影響名字決定與使用的重要因素。不同教育程度的父母在為子女命名時自有不同的策略和命名模式。教育程度較高的父母有較好的文字能力，可以使用多種的媒體（如閱聽國外雜誌、影視節目）、參考較多的歷史人物與事件，閱讀較為廣泛的文史典籍，在為子女命名時可能會考慮較多的單字、意象和視界，甚至會使用一些稀少難懂的字眼來產生區隔作用，劃分彼此的社會界線。相較之下，教育程度較低的父母可以選擇的字庫就顯得有限，子女名字的類似程度也就會比較高，內在變異性小。下面的訪問可以看出這樣的差異：

由名字亦可對命名者之社會階級略為區分，由我的家族來看，明香、癸妹、秀英、俊明、惠珠、乾祥、裕祥，以上命名者的學歷至高到高工畢業，大都是小學初中等教育程度，職業大都為農人或一般公務員，可看出用字比較有限，與別人同名字比例甚高。、、、相較之下，翠微、曉微、勁生，較不容易與他人撞名，其中翠微一詞更出自唐詩，李白，下終南山過剡斯山人宿至酒。「…卻故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翠微即青黛色之意，在此形容山的景色。曉微此名，也是因為在二姐出生之時，正值天剛破曉。雖不脫傳統以自然景物為女子命名，但其命名方式，卻間接表現了命名者的文化修養，屬於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Y4)

教育程度較低者由於無法自己命名，往往必需求助他人，戶政事務所的人員

就是最常見的一種，也因此出現了特殊的名字。

至於外公和外婆的部分，外公「□漏港」、外婆「□□甚」、由於外公的家族是以捕魚為業，所以取名時，取音本來是「牢港」（台語），捕魚人都希望有個牢靠的避風港能依靠，所以外公名字本是要取這個意思，但是去戶政事務所登記時，受理人員可能不懂台語或為外省人士，誤將台語的發音當作國語，所以外公的名字就成了「漏港」，和原本的意思差距頗大。（L4）

而媽媽的名字，和戶政人員也有密切的乖關係，在取名的時候，家人原本希望女生要帶有點「素氣」（台語）的感覺，大概是單純、有氣質之意，想不到去戶政事務所登記時，也因辦理人員誤解台語，直接翻成國語，就成了「□素氣」。也因這個名字太常被同學取笑，所以國中時改名為「□素麗」。

向上的社會流動機會會讓許多父母對於未來充滿希望，認為下一代會過得更好。這種對於未來的期望也會表現在名字的決定上。

祖父母的年代適逢日據時期跟國民政府來台，時局相當不安，一般百姓生活貧苦，且社會階級流動停滯，對於剛出生的祖父母所背負的期盼不外乎〈吃飽，平安成長〉，而對女性來說，找個好丈夫比一切都重要，故也不偏重取名，畢竟女兒是所謂的賠錢貨，叫什麼名字也較不重要；到了父母親那一代，因為祖父母在日治時期都上過小學校，也稍微懂一些較為文雅的字，且因時局安穩，雖有嚴厲的政府戒嚴，但社會階級開始流動，所以在為父母親那一代取名時，會為家族社會地位著想，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出人頭地，成為家族、社會的精英，更者還會請算命師批命取名。

在不是那麼上流社會中出生的小孩，往往他們的父母親都是樸實認真知命的人民，他們在面對命名時，我想大多都是採取保守的態度在命名，比較不會去想如果自己的小孩有個好名字，在未來的路上會更有好運勢，更接近榮華富貴，反倒是樂天的為自己小孩命名；相對的如果是較高的階層或

上流社會的人，他們一定是希望自己的家族小孩能過得好能延續好家族，所以在取名時，也就特別的別出心裁，花了許多心思在命名的字眼和筆劃。(H6)

從年代來看全家的命名，由於外公的家族是一般人所說的望族，所以家族的命名，都有一定的順序。以女性而言，就是娟、珍…，男性的話，就是彬、富…諸如此類的命名，曾聽媽媽說過，他們除了最後一個字有順序外，連中間的「麗」及舅舅們的「瑞」，都是代表他們這輩的男女的輩份，因此，我的小表弟小表妹（母親那邊的）中間就是用崇（男）及巧（女）來代表。媽媽也說他們的命名，基本上都是有固定的，所以不能隨便更動的。這點就真的讓我第一次聽到，原來名字有時還不能挑喔？相反的，爸爸那邊，因為受教程度並不高，所以在命名時也就沒考慮這麼多，雖然一樣有照輩份來命名，但聽爸爸說似乎規定沒那麼的嚴格。(W3)

5.0 討論與結論

本文的寫作目的是探討客家人的名字與命名。過去以來，名字並不是一個曾經被社會學重視過的研究主題，先前累積的文獻資料也相對有限，所以本文基本上是一個嘗試摸索多於理論建構的寫作計劃。作者希望透過整理一些有關名字的資料，釐清一些問題和想法，磚引更多的討論。

本文主要從兩個角度來瞭解「名字與命名」，其一是文化適應，其二是象徵鬥爭。文化適應指的是，人類在面對環境變化（自然的與社會的）時所發展出來的一種生存策略。早期人類面臨的最大生存威脅是來自於自然界，如氣候、天災、野獸攻擊、食物缺乏等等。後來隨著人類文明與知識的累積，許多人為的制度與文化傳統也成為人類生存所必須面對與克服的難題。在現代社會的開展過程中，許多新生的政治社會制度也成為影響人類行為的重要因素，如國家機器的建立與滲透、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都會文明與生活方式、大眾媒體的普及、全球化的影響等。本文即是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名字使用與改變所具有之文化適應的意義。

什麼是象徵鬥爭呢？本文所指的鬥爭和傳統使用意義並不一樣，不再是傳統階級鬥爭中所謂的武裝衝突而已。波迪爾認為，品味是階級的指標，品味與生活言行的區隔正

是權力競爭的最佳寫照。延續、鞏固、再製宰制階級的最佳方法，莫過於維繫高品味的生活言行（衣食住行與審美活動），對於低品味保持一種區隔和鄙視。而如果要推翻既存的宰制階級，就要創造品味、建構新的生活言行，這是一種權力鬥爭，也是象徵鬥爭。社會鬥爭是一種不斷競爭象徵權力的過程，其目標就是取得文化正當性，藉以定義文化秩序。本文認為名字的決定和使用就是一種象徵鬥爭，可以為既存的文化秩序提供正當性的基礎。

名字與命名是本文分析人類社會的一個切入點。名字的決定和使用一方面表現了環境變遷與人類適應的軌跡，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象徵權力的操作面向。名字與命名的變化反應了人類面對環境改變時所產生的文化適應，可是不論發生何種環境變遷，名字與命名所隱含的權力操作與象徵鬥爭並沒有因此而消失。

就文化適應的角度來看，客家人名字的決定和使用受到了那些環境變化的影響？在考量台灣社會的發展和結構變遷之下，主要的環境變化來自於宗族組織的式微、國家機器的滲透、媒體環境的改變、都會文明的興起。這些變化也為名字的決定和使用帶來了一些改變。

第一，宗族社會的式微。在傳統宗族社會中，名字代表了個人的宗族地位與社會身份。隨著宗族社會的式微，個人逐漸從宗族組織中解放出來，宗族對於個人的約束力逐漸減弱，個人對於宗族的依賴也開始降低。在經濟發展的推動下，個人獲得了獨立的經濟機會，不再需要依靠家族提供土地和經濟資源。隨之而來的一個轉變就是傳統命名規範的鬆動，具體言之，就是命名權的轉移和命名觀點的改變。為人父母者在命名一事上獲得了過去所沒有的自主性，名字的決定和使用不再需要依據「祖宗的規定」。

第二，國家機器的滲透。農業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來往強調的是歸屬身分，彼此的稱呼也是以親屬關係和角色為主（如二嫂、三舅、堂兄、表妹），直呼本名的機會並不多見。到了現代國家出現之後，戶政的推動是現代國家的重要基礎建設。如何登錄人口的出生、死亡或流動成為一件重要的事情。而透過現代法治社會的建立，個人也是權利與義務的基本承載單位，每一個人都常常必須直接而完整的使用全名。名字的決定和使用也因此成為一件無法迴避的事情。

第三，現代都會文明的出現。為了維持生產的彈性，由資本主義主導的現代社會特色之一就是地理流動與社會流動。個人需要快速地進出許多不同的地理位置，也有很多機會接觸許多異質的社會人口。名字的功能不再只是個人家族身份的代表，而是和陌生人互動的一種工具。到了今天，取名字的考量不再需要背負光宗耀祖的期待，也不只是

要如何避免成為別人嘲笑的對象，而是已逐漸轉型成為印象經營的一部份。

第四，媒體環境的興起。脫離了家族影響是一回事，不再根據祖宗的規定之後要如何命名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在許多可能的影響下，大眾媒體的興起也會影響一般人決定名字的方式，公眾人物或流行趨勢會成為許多人命名的參考，名字的集中程度或重複性也會因此而改變。這些年來媒體經常報導的菜市場名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在環境變化下，名字的決定和使用做為一種文化適應也出現了一些世俗化的轉向。第一，唯美化，名字的決定以印象經營為主。第二，命理化，名字的意義出現扁平化與去典故化。就印象經營而言，為了要在快速流動的現代社會中營建人際關係，一個人的名字好不好聽、印象是否深刻就變得非常重要。名字常是自己和陌生人互動的第一步，好不好聽、好不好記也因此成為一個在決定名字時不可忽略的因素。

第二個轉向是，名字的決定和使用出現了外包化和命理化的趨勢。現代人在面對高度競爭與不確定因素時，名字的命理化成為一種文化保險與心理輔導機制。在命理因素考量下，名字的意義呈現扁平化與去典故化。不同於過去對於人事物的紀念性，今日許多名字的決定是遷就於筆畫、部首、八字等命理因素的考量。如此一來，名字中可以有的故事和紀念意義也都被捨棄。

除了文化適應之外，象徵鬥爭是本文的第二種分析角度。從象徵鬥爭的角度觀察，名字不只是一種文化鬥爭，也是一種社會鬥爭。在各個不同的社會階層意涵之中，名字透露出來的性別差異最為明顯。不論是在用字選擇、集中程度、意象內容上，男女名字都有明顯的差異。首先，男女有著幾乎完全不一樣的字庫。其次，男女名字的集中程度並不一樣，男名重複性低、變異大，女名重複性高、變異小。第三，兩性名字有著明顯不同的意義和意象指涉，男名表現出對於品德、知識和權力的重視，女名則以感官化和飾物化為主。

與其說名字可分為男人的名字或女人的名字，倒不如說名字中只有宰制者的名字和被宰制者的名字。所謂的「好名字」，常與權力、公共事務、收入、財富、能力、品德、知識有關，而這樣的名字多是由宰制階層（男性、中上階級）所壟斷，藉以正當化世界觀並延續既存的宰制關係。相對的，受宰制者（女性、中下階級）的名字多半與權力、財富、聲望無關，也使他們願意接受目前的社會位置與角色規範。

至於名字的階級意涵，我們則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第一，在社會變遷的影響下，台灣社會在二十世紀中本身的富裕發展，帶來了明顯的向上流動機會，自認為是中產階級者的比例大幅增加，也出現了許多向上模仿的文化行為。向上的社會流動機會讓許多

人相信，下一代的子女會比父母這一代能有更好的生活條件與發展機會，影響之一就是民眾使用名字的變化。有些名字會被捨棄（如添財、水旺、進福），父母的命名期望也不再直接訴求物質條件的滿足，取而代之的是許多命名上的模仿行為，菜市場名的出現就是一例。

命名的模仿行為對於宰制階級會產生一定程度的文化壓力。爲了逃避通俗化的危機，宰制階級則會嘗試新的命名方式。原先宰制階級採取的命名方式可分爲兩類，一以文化資本爲主，一以經濟資本爲主。以文化資本爲主的統治派系，其命名方式強調的是深奧知識與文化典故的賣弄，而以經濟資本爲主的統治派系，其命名方式則會強調命理因素的考量。這兩種命名方式也很快的會成爲被模仿的對象，瓊瑤式的小說人物名字（如子軒、思涵）就是最明顯的例子。此外，命理考量也成爲民眾競相模仿命名的參考。許多民眾開始注重名字的筆劃、部首時，當然這也和命理命名產業的推波助瀾有關。在這個意義上，名字的決定和使用具有文化社會學的分析價值，因爲不同社會階級在命名上的模仿與競爭，正是命名文化的變遷與名字差異發生的原因。

也許我們除了分辨男人的名字和女人的名字，或是所謂的讀書人的名字和賺吃人的名字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分辨優勢者的名字（也就是所謂的好名字）和弱勢者的名字（也就是所謂的不好的名字）。這兩種名字之間存在著一種不對稱的使用關係，弱勢者會模仿優勢者的名字，優勢者則不會模仿弱勢者的名字，只好努力開發尋找新的名字和命名方式，以避免名字的女性化或通俗化，而這也是文化差異（新名字）的發生原因。所以我們比較容易看到女孩子使用一個比較中性或是男性化的名字（如立維、康人），但卻比較不容易看到男孩子使用一個女性化的名字（如麗紅、素婉）。同樣的，讀書人也比較不會以經濟資本的考量來爲下一代取名（如添財、金發）。

就現實關照而言，本文希望提供一個不同於傳統命理解釋的觀點。傳統命理學傾向於以一種本質化的觀點來看待名字的差異與延伸意義。名字的筆畫、格數、總數、部首常常意謂著某種已經決定的愛情發展或是家庭婚姻關係。近年來，在社會快速變遷之下，或是爲了求得安身立命的保障，或是爲了求取事業功名，「命名/改名」的人也因此多了起來。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國家戶政機關在相關事務上的便民務實，但其背後也透露出許多民眾的動機與期待，這些動機與期待更有值得我們注意的文化與社會意義。

「命名/改名」現象的出現是因爲命理專業知識與技術的突飛猛進，還是因爲一般民眾的困惑增加了？民眾是否是在無所適從之下，只好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將現實問題

的解決寄放在命名與改名之上。本文相信，對於想改名的人而言，如果電視機壞了，他們會找電器行來修，汽車出了問題會找修車行來處理。如果你告訴他們，把出了問題的電視機或汽車拿到土地公廟請土地公來修的話，他們一定會罵你神經病。但他們為什麼在一些問題的解決上會去找算命師或命理業者來解決呢？本文相信，這些困擾的問題常常是這個社會或是個人能力所無法解決的，例如生意不好？夫妻失和？小孩子無法管教？久病不愈？

現代社會愈來愈複雜，人際關係多變，面對這樣的一個多變而複雜的環境，一般人希望可以迅速地找到一個容易可行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在這種情形下，命理業者提供的答案就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彷彿「只要改名字、只要改變家中的擺設」，一切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雖然本文並不鼓勵這樣的行為，但也不願意給予太多的指責或是對其貼上「迷信」的標籤。本文希望強調的是，我們並不是不可以改名字，而是除了改名字之外，我們還有許多可以努力的事情。

不同於一般命理的分析角度，本文嘗試分析「名字/命名」背後所蘊含的文化與社會意義，提供我們看待名字的另一種角度。名字的決定、使用、流行或是改變，自有其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社會動能。能夠從這個角度來觀察，也許可以避免我們過度以一種本質化的態度去理解或是相信命理化的處理方式，也不會對名字抱著太多不切實際的期望。

改名有效嗎？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也是一個在理論假設和研究方法上極具挑戰的問題。雖然本文並沒有能夠回答此一問題，但仍可嘗試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如果改名是有效的，其主要原因是因為名字本身的改變呢？還是因為改名過程中所產生的心理調適或是環境準備呢？我們知道，相關並不等於因果，如何透過嚴謹的研究設計與實證資料的收集，吾人才能更合理的回答此一問題。

一百年過去了，台灣社會發生許多變化。台灣地區人口數量從不足四百萬逐漸增加至兩千兩百萬，其間還有一九四零年代末期大量移入的大陸來台人士。此間，民眾教育程度的提高、經濟結構的改變、家庭型態的轉變、外來文化的衝擊等都會對台灣社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在這樣的認識下，一些命名選擇上的改變似乎是可以期待的。但也因為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時間又長，如果要從中得到某些合理可接受的觀察或結論並不容易。

對於台灣社會百年來命名模式或特色的了解來說，本文只是一個初步且粗糙的嘗試而已。本文主旨是想對於台灣社會兩性名字的長期趨勢變化提出一個初始的觀察。就像

乘坐飛機探勘地形一樣，觀察者只能就地形的高低起伏、河川流向提出一個粗略的描繪，但卻無法詳細地紀錄地貌的變化。在這樣的認識之下，本文所能完成的工作毋寧是相當有限而片面的，但筆者仍希望這樣的嘗試可以磚引出一些批評和看法，讓我們可以從更多不同的理論、方法和資料中來切入這個尚待開發的議題。例如，在多元文化的趨勢下，隨著泛客家認同運動的出現，客家人是否會更重視宗族組織或是強調字輩的使用，這是否也將成為客家人的命名特色之一？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 王雅萍（1994）〈他們的歷史寫在名字上 - 透過姓名制度的變遷對台灣原住民的觀察〉，《台灣風物》，44（1）：63-80。
- 林修澈（1976）〈名制的結構〉，《東方雜誌》，10（2）：52-61。
- 李廣均（1999）〈什麼是族群身份？三種不同取徑的提出和討論〉，《社會文化學報》，9：67-94。
- 李廣均（2000）〈性別、族群與命名 - 戰後台灣經驗的初探〉，發表於一九九九年台灣社會學社年度學術研討會「全球化下的社會學想像：國家、經濟與社會」，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五日於台灣大學。
- 李廣均（2002a）〈男人的名字和女人的名字-以「國家考試金榜題名錄」中華民國六十五年至七十四年考試及格人員為例〉，《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新刊一號（原《婦女與兩性學刊》第十三期）：83-121。
- 李廣均（2002b）〈名字、性別與社會：一些資料和一些想法〉，發表於兩千零二年台灣社會學會年度研討會「重訪東亞」，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於東海大學。
- 彭道根（1991）《國家考試金榜題名錄》。台北：金廬出版社。
- 楊國鑫（1988）〈客家婦女名字「妹」的研究〉，《三台雜誌》，16：22-31。
- 楊國鑫（1988）〈客家婦女名字「妹」字再探〉，《三台雜誌》，17：7-15。
- 歐陽宗書（1998）〈中國的字輩文化〉，《臺灣源流》9：49-57。
- 劉增貴（1996）〈漢代婦女的名字〉，《新史學》7（4）：33-94。

英文部份

- Alford, Richard D. 1988. *Naming and Identity: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Personal Naming Practices*. New Haven, Conn.: Hraf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89,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Sociological Theory*,

7 (1): 14-25.

Davis, James A. 1958.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Perception of Status Symbols."

The Midwest Sociologist 21:1-11.

Dunkling, Leslie Alan. 1977. *First Names First*. Don Mills, Ontario, Canada : General Publishing.

Eagleson, Oran W. and Antoinette D. Cliffor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Names of White and Negro Women College Student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1:57-64.

Ellefson, Connie Lockhart. 1987. *The Melting Pot Book of Names*. White Hall, VA: Betterway 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

Hanks, P. and F. Hodges. 1990. *A Dictionary of First Na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mont, Michele and Annette Lareau. 1988. "Cultural Capital: Allusions, Gaps and Glissandos in Rec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Sociological Theory* 6:153-68.

Lawson, Edwin D. 1984. "Personal Names: 100 Years of Social Science Contributions." *Names* 32:45-73.

Lawson, Edwin D. 1987. *Personal Names and Nami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Lieberson, Stanley. 1984. "What is in a name? ... Some Sociolinguistic Possibil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45:77-87.

Lieberson, Stanley and Eleanor O. Bell. 1992. "Children's First Nam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Social Tas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511-554.

Lieberson, Stanley and Kelly S. Mikelson. 1995. "Distinctive African American Names: An Experimental,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Analysis of Innov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928-946.

Miller, Nathan. 1927. "Some Aspects of the Name in Culture-Hist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2:585-600.

- Paustian, P. Robert. 1978. "The Evolution of Personal Naming Practices among American Blacks." *Names* 26:177-91.
- Puckett, Newbell Niles. 1975. *Black Names in America: Origins and Usage*. Boston: G.K. Hall.
- Rossi, Alice S. 1965. "Naming Children in Middle-Class Famil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499-513.
- Skipper, James K., Jr. 1984. "The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Nicknames: The Case of Baseball Players." *Journal of Sport Behavior* 7:28-38.
- Smith-bannister, Scott. 1997. *Names and Naming Patterns in England 1538-17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Steward, George R. 1979. *American Given Names: Their Origin and Histo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Stephen. 1998. *The Means of Naming -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Personal Naming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UK: UCL Press.
- Withycombe, E. G. 1977.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Christian Names, third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 Zelinsky, Wilbur. 1970. "Cultural Variation in Personal Name Patterns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0:743-69.